

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中的大学生容忍度效应分析 ——基于A省6所高校的调研

■ 姜正华 曾明

(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近年来不断爆发的高校性骚扰问题使其成为了社会热点。高校性骚扰可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对A省6所高校1562名学生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证实,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会影响性骚扰治理成效,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高,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低,容忍度越低治理成效越好,容忍度越高治理成效越差。改善治理,需要尽快出台性骚扰防治专项政策,并加强宣传教育,降低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强化对“反馈型性骚扰”的打击力度,建立高校性骚扰强制报告机制,对高校性骚扰实行“零容忍”。

【关键词】高校性骚扰 治理失灵 大学生容忍度 单向型性骚扰 反馈型性骚扰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性骚扰是全世界高校治理的顽疾,对高校声誉、生态都影响甚大。美国学者调查发现,每两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在大学期间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并且身心会有许多负面影响^[1]。近年来,我国高校性骚扰事件接二连三在网上曝光,2014年7月爆发的厦门大学博导吴××性骚扰女学生事件^[2],促使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性骚扰的治理提上议程,同年9月教育部紧急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3],开展治理。但是,2016年,由美国演艺界发起的“Me Too”运动,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性骚扰的持续爆料,我国网络上曝光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呈现增长态势,让高校性骚扰成为了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2018年11月教育部加大力度,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高校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并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惩罚和责任追究措施^[4]。在高校

收稿日期:2019-11-25

作者简介:姜正华,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腐败治理;曾明,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腐败治理、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治理逻辑下基层善治的条块关系效应研究”(课题编号:19BGL204);2019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性知识来源与高校性骚扰容忍度研究”(课题编号:GL19246);2018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高校同级监督体制机制构建研究”(课题编号:JD18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性骚扰政策出台后,性骚扰的现状究竟如何?2015年,有学者对川、皖两所高校的129名女研究生进行调查,其中承认自己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为7%,认为自己周围的同学或在其他高校读研的朋友遭遇过性骚扰的则达32.56%^[5]。另有学者2019年发表的文章显示,1631名被调查大学生中有6.6%报告在学校遭遇过性骚扰,其中来自教职工的性骚扰占被骚扰比例的54.3%^[6]。可见高校性骚扰的发生率在有关政策出台后并未得到明显的降低,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居高不下,出现了治理失灵的现象。那么,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的现状到底如何,为什么高校性骚扰的治理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治理失灵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成为特别需要进一步研究回答的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组织对性骚扰采取的政策措施体现了组织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会影响性骚扰的发生。而个体对性骚扰的容忍度是组织环境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性骚扰容忍度的高低会体现在遭遇性骚扰时的应对策略上,保持沉默或者举报等。沉默会使得组织不能及时发现性骚扰问题,对性骚扰实施者进行惩处,政策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会纵容骚扰者继续实施骚扰。而举报能够为组织落实惩治性骚扰的制度、及时制止、惩罚骚扰者带来帮助,从而达到降低性骚扰的效果。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会影响性骚扰政策的有效执行,容忍度越低政策执行效果越好,容忍度越高政策执行效果越差。

本文通过对A省6所大学1562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的现状,并通过数据分析来试图验证上述假设。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与定义。本研究的高校性骚扰的范围界定在大学生遭遇来自教职工的性骚扰。有学者认为“校园性骚扰是指发生在校园环境中的教师对学生实施的侵犯学生性自主权的民事侵权行为^[7]。”这个定义比较抽象,不利于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因此我们将高校性骚扰定义进一步细化为:高校教职工违背学生的意愿,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抚摸猥亵行为等任何形式,对校内外学生个体或群体实施与性有关的,会令学生身体或心理上产生不适的骚扰行为。

高校性骚扰的两种类型。根据已有的调查研究,性骚扰形式有讲“黄段子”、发色情短信、强行身体接触或言语侵犯、故意让对方看色情图片、长时间注视身体敏感部位、对私人生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强制喝酒、威逼利诱要求发生性关系等。梳理这些文献,我们将性骚扰归纳为两种类别,第一种命名为“单向型性骚扰”,特点是可以由骚扰者单独完成,无需迫使学生配合,相对较为轻微,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轻微或无影响,比如教师课堂讲黄色笑话。第二种命名为“反馈型性骚扰”,特点是不能够由骚扰者单独完成,需要迫使学生配合,相对较为严重,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较大,比如强行亲吻学生等。

调查问卷的设计。设计调查问卷前,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对B校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心理咨询教师、遭遇过性骚扰的2名学生、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一是控制变量。主要是学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级、专业等13个问题;二是因变量。高校性骚扰政策的执行效果,通过设计是否遭遇过来自教师的性骚扰进行测量。同时为了了解性骚扰治理失灵现状,还设计了遭遇性骚扰的形式、遭受的负面影响及应对举措等,共32个问题。三是解释变量。设计了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测量,通过设计教师对学生采取的具体情形,让学生来判断其是否性骚扰及其严重程度。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对性骚扰容忍

度的测量,设计了不是、轻微、一般、较重、严重五个等级。问卷设计好之后,在B校的C班56名学生中进行了试测,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开展调查。

开展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为A省本科生和研究生,随机抽取A省6所高校,以整群抽样方法随机调查1562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抽样方法以每个学校本科、硕士各年级的专业为总样本,按照2.5%的比例抽取相应年级的专业,再由所抽取年级专业学号尾号为奇数的学生作答。通过所抽取学校有关部门帮助,直接发送二维码或网址给被抽取的学生进行网络作答,作答结果直接进入后台数据库,并且每个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相互干扰和一人作答多份的情况。回收有效样本1550份,有效率为99.2%。我们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Cronbach Alpha系数值为0.921,大于0.6,达到可接受的水平(Carmin-es Zeller, 1979),问卷的信度比较好。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Bartlett球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可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O值为0.843,问卷的效度较好。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	%	类别	人数	%	类别	人数	%
性别	男生	887	57.2	女生	663	42.8			
学习阶段	本科生	1268	81.8	研究生	302	18.2			
就读年级	大一	483	31.2	大二	292	18.8	大三	436	28.1
	大四以上	54	3.5	研一	144	9.3	研二以上	142	9.1
就读学科	文科	559	36	理科	991	64			
生源地	农村	769	59.6	县城	172	11.1	地市以上	609	39.3
性态度自评	很保守	113	7.3	比较保守	375	24.2	一般	747	48.2
	比较开放	265	17.1	很开放	50	3.2			

三、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现状分析

1. 高校性骚扰在“面”上和“点”上都未能得到有效抑制,需要既全面、又精准化地施策

根据高校性骚扰的定义及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分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两类,我们从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方面设计了学生遭遇教师性骚扰情形的问题,具体调查情况见下页表2。

根据表2数据可知。一是高校性骚扰政策未能有效抑制性骚扰的发生。9种形式都有,遭遇313人次,比率达到20.4%;遭遇人数249人,比率为16.1%。由于还可能存在教师对学生性骚扰的其他情形未列入问卷,高校教师对学生性骚扰的实际比例应该比调查数据要高。二是高校性骚扰政策需要精准发力。遭遇“单向型性骚扰”的比率为18.2%,反映出被调查高校师德师风差。遭遇“反馈型性骚扰”的比率为2.2%,比率虽低,但是对学生个体危害大。遭遇教师重复性骚扰的较多,占调查人数的4%,占遭遇性骚扰人数的25%,遭遇多次性骚扰的人数远远超过遭遇过3次的人数。可见高校性骚扰政策一方面需要在整体上遏制性骚扰的发生,另一方面需要对“单向型性骚扰”“反馈型性骚扰”“重复性骚扰”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表2 大学生遭遇教师性骚扰现状

情形	未遭遇过	遭遇过(人次)					合计	%
		1次	2次	3次	4次以上			
单向型性骚扰	老师课堂上讲黄段子	1 326	95	54	10	65	224	14.5
	异性老师对您外貌带有色情的评论	1 528	14	5	0	3	22	1.4
	异性老师给您暧昧的信息	1 536	9	3	0	2	14	0.9
	异性老师盯着您身体敏感部位	1 528	17	4	0	1	22	1.4
	单向型合计遭遇人次数							18.2
反馈型性骚扰	异性老师单独约您到宿舍等私密场所	1 538	7	3	1	1	12	0.8
	异性老师故意触碰您身体	1 536	11	1	1	1	14	0.9
	异性老师请您帮他按摩身体	1 548	1	1	0	0	2	0.1
	异性老师搂抱、亲吻您	1 546	1	0	0	1	2	0.3
	异性老师威逼利诱要和您发生性关系	1 549	1	0	0	0	1	0.1
反馈型合计遭遇人次数							2.2	
合计遭遇人次数		156	71	12	74	313	20.4	
合计遭遇人数 249 人(其中重复遭遇 64 人)							16.1	

2. “单向型性骚扰”对组织的危害大,“反馈型性骚扰”对个体的危害大,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对于大学生遭遇性骚扰后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我们从有些欣喜、没有影响、产生负面情绪、影响学业、生活和对教师的信任等方面进行调查,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教师性骚扰对大学生的影响

	不吻合数		有点吻合以上数及百分比				
	人数	%	有点吻合	部分吻合	比较吻合	完全吻合	%
感觉这事比较正常,没有什么影响	31	97	1	0	0	0	3
证明我吸引了老师,有些欣喜	29	91	1	1	1	0	9
有羞耻和受侮辱的感觉	10	31	1	5	7	9	69
有些怕和担心	10	31	2	3	9	8	69
造成了焦虑、恐惧等心理负担	9	28	5	3	6	9	72
不想上课,甚至开始逃课躲避老师	10	31	5	2	6	9	69
对老师群体的信任感开始下降	8	25	5	3	9	7	75
强烈颠覆了尊师重教的价值观	9	28	2	6	9	6	72

根据表2、表3的数据可知:一是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较高。虽然绝大部分大学生能够识别“单向型性骚扰”,并不认为对自己造成了影响,容忍度较高,但是对师德师风的影响却较坏,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师德师风建设,降低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二是“反馈型性骚扰”很少,但是负面影响较大。31名遭遇“反馈型性骚扰”的学生,有26名回答了

影响,其中有 18 名学生的情绪、学业、生活、对教师的信任感受到了影响。“反馈型性骚扰”虽然很少,但是一旦发生,就会对学生造成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需要对这类的教师行为进行更加严厉的惩治,对学生及时进行心理辅导。

3. 大学生能积极有效应对性骚扰的较少,需要高校展示“零容忍”的态度和行动

针对大学生遭遇教师性骚扰后采取的应对方式,我们从无助、忍受、求助、反抗、举报等不同层面设计问题调查了解,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大学生遭遇教师性骚扰的应对

	不吻合数		有点吻合以上及百分比				
	人数	%	有点吻合	部分吻合	比较吻合	完全吻合	%
欣然接受老师的行为	29	91	0	2	1	0	9
无奈的忍受老师的行为	23	72	1	5	0	3	28
想办法躲开	9	28	3	3	9	8	72
向同学倾诉、求助	12	38	1	6	7	6	62
向家人倾诉、求助	14	44	2	3	6	7	56
向信任的老师倾诉、求助	17	53	2	5	5	3	47
通过网络等查询应对办法	12	38	4	5	5	6	62
到心理咨询机构咨询	14	44	5	5	4	4	56
斥责老师停止上述行为	11	34	4	5	4	8	66
通过网络曝光骚扰者	13	41	3	10	3	3	59
要求骚扰者赔偿、补偿	15	47	5	4	5	3	53
向学校有关机构投诉	13	41	5	5	3	6	59
报警	13	41	6	3	4	6	59

表 4 的调查数据反映出如下三个现象:一是学生保守式的“理性”躲避是主流。学生遭遇性骚扰时选择躲避的达到 72%。这是在性别歧视的文化背景和教师权力影响双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这种沉默的躲避往往无法制止骚扰者的进一步骚扰,为许多学生遭遇 4 次以上重复性骚扰带来了隐患。二是高校在防治性骚扰上需要加强力度。在面临性骚扰时,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寻求帮助的对象依次是同学、网络、家人、心理咨询机构、教师,可见学生对教师、对学校的信任感还有待提升。这反映出高校未能让大学生感受到其对待性骚扰“零容忍”的态度和行动,高校治理性骚扰还不够坚强有力。三是学生个人开放的性观念不容忽视。调查数据中,有些同学表示可以欣然接受教师的性骚扰行为,更有学生是主动骚扰教师,认为教师对自己的暧昧行为让自己在同学前有面子。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大学生价值观的偏差不容忽视,开放的性观念导致了高的性骚扰容忍度,而高的容忍度又会纵容性骚扰。

4. 部分学生对性骚扰认知不清,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较高,需加强宣传教育

通过受访者对具体情形是否是性骚扰的判断,来测量受访者性骚扰容忍度。答案的选项分别为不是、轻微、一般、较重、严重,我们对其相应赋值为 1、2、3、4、5,并且求出均值,分值越高表示容忍度越低。具体情况见下页表 5。

由下页表 5 可以看出,一是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差异较大。“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几乎都在均值之上,容忍度相对较低,可见这是高校性骚扰治理的重点。只有对“私下拥抱”的容忍度在均值之下,这应该是拥抱作为一种社交礼仪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都在均值之下,容忍度相对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纵容“单向型性骚扰”的发生,对营造良好师德师风的教育环境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是高

校性骚扰治理不可忽略的方面;二是部分学生对性骚扰的认知观念不强。有 31.9% 的学生认为教师课堂讲黄色笑话不是性骚扰,11.3% 的学生认为对相貌色情评论不是性骚扰,5.9% 的学生认为亲吻不是性骚扰。可见,要进一步加强性骚扰识别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单向型性骚扰”的识别教育,着力降低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

表 5 受访者对性骚扰具体形式容忍度的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单向型性骚扰	课堂讲黄段子	1	5	2.23	1.174
	拍肩膀	1	5	2.84	1.311
	对相貌色情评论	1	5	3.03	1.191
	发暧昧信息	1	5	3.54	1.215
	盯身体敏感部位	1	5	3.69	1.214
	私下拥抱	1	5	3.69	1.301
	约到家庭、宿舍等私密场所	1	5	4.05	1.268
反馈型性骚扰	强求陪酒	1	5	4.28	1.163
	亲吻	1	5	4.49	1.061
	摸敏感部位	1	5	4.64	1.003
	要求性关系	1	5	4.71	0.964
	有效个案数(成列)	1 550		3.81	

四、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对高校性骚扰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1. 提取“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两类容忍度测量因子

在测量性骚扰容忍度时,我们设计了 11 种情形。通过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发现,性骚扰容忍度测量指标 Bartlett 球度检验的概率 P 值为 0.000, KMO 值为 0.895,性骚扰容忍度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Bartlett 球度检验的概率 P 值为 0.000, KMO 值为 0.798,可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问卷的效度较好。根据 KMO 度量标准可知,本文的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为了降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同时列示总方差,分别对初始因子解的方差、提取因子解的方差和旋转因子解的方差解释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见下页表 6、表 7。

从下面表 6、表 7 可以看到,从 11 个具体情形中我们提取了“反馈型性骚扰”“单向型性骚扰”2 个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1.621%。随后将这 2 个公共因子进行提取和旋转,其累计解释总方差百分比和初始解的前 2 个变量相同,但经旋转后的因子重新分配各个因子的解释原始变量的方差,使得因子的方差更为接近,也更容易解释。比较旋转前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发现旋转后的因子含义更为清楚和集中,更容易类别化。对照问卷的问题内容以及因子载荷,我们将值大于 0.6 的归为一类因子,发现第一个因子中的性骚扰形式正好对应“反馈型性骚扰”。第二个因子中的性骚扰形式正好对应“单向型性骚扰”。这对我们将高校性骚扰划分为“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提供了检验和印证。

表6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成分			
	反馈型性骚扰		单向型性骚扰	
	旋转后	旋转前	旋转后	旋转前
课堂讲黄段子	0.388	-0.070	0.695	0.792
相貌色情评论	0.663	0.235	0.556	0.833
发暧昧信息	0.792	0.503	0.270	0.669
盯身体敏感部位	0.815	0.568	0.188	0.614
约到私密场所	0.843	0.701	-0.007	0.468
强求陪酒	0.868	0.808	-0.161	0.356
拍肩膀	0.613	0.367	0.249	0.551
拥抱	0.764	0.635	-0.006	0.425
亲吻	0.855	0.904	-0.350	0.191
摸敏感部位	0.847	0.935	-0.417	0.132
要求性关系	0.800	0.912	-0.445	0.082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3次迭代后已收敛。

表7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1	6.396	58.145	58.145	6.396	58.145	58.145	4.841	44.013	44.013
2	1.482	13.476	71.621	1.482	13.476	71.621	3.037	27.608	71.621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2. 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对高校性骚扰治理的影响,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是否遭遇过来自教职工性骚扰的问题,调查显示有249名大学生遭遇过来自教职工的性骚扰。在大学生对性骚扰容忍度的测量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差别较大。我们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分别验证了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对性骚扰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

一是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能够显著影响高校性骚扰的治理成效,容忍度越低,高校性骚扰行为发生越少,也就是治理成效越好。绝大部分遭遇“反馈型性骚扰”的大学生能够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报告学校及时采取有力的惩治措施,会对骚扰者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降低高校性骚扰的发生。二是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不能够显著影响高校性骚扰的治理成效。这也可以从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态度和应对措施调查结果进行解释。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较高,态度相对比较平淡,不会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进行应对,高校对性骚扰的实施者未能进行有效的惩处,政策措施得不到有效实施,从而影响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降低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当遭遇性骚扰时,应积极主动向学校报告,为高校对性骚扰实施者惩处机制的启动按下“启动键”。

五、结论

本文在对A省6所高校1562名学生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从政策目标群体(大学生)的角

度,分析了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1. 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差异较大

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相对较低,可见一旦发生“反馈型性骚扰”会对学生产生较大的伤害,这是高校性骚扰治理的重点。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相对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纵容“单向型性骚扰”的发生,对营造良好师德师风的教育环境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是高校性骚扰治理不可忽视的方面。

2. 政策目标群体(大学生)容忍度是性骚扰政策失灵的重要因素

容忍度越低,政策执行效果越好,容忍度越高,政策执行效果越差。高校性骚扰治理中,大学生作为性骚扰政策的目标群体之一,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较低,能够积极报告性骚扰情况,从而促进性骚扰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较高,不会积极地报告性骚扰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或者纵容了该类型性骚扰的发生,是高校性骚扰治理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着力降低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

3. 对高校性骚扰存在治理失灵的情况,需要分类施策

表现在高校性骚扰在“面”上和“点”上都未能得到有效抑制,“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分别会对组织和个人产生负面影响,大学生能够积极有效应对性骚扰的较少,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还较高。因此,需要尽快出台高校防止性骚扰的专门政策,明确性骚扰治理的领导机制、宣教机制、查处机制、保障机制等;根据两种类型的性骚扰的特点和影响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强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宣传教育,提升大学生对性骚扰的认知水平,降低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强化对“反馈型性骚扰”惩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建立高校性骚扰强制报告制度,为性骚扰查处机制的启动创造条件,对高校性骚扰实行“零容忍”。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受制于调查的资源所限,仅对A省6所本科院校进行调查,各省的性骚扰现状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同时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因素未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展开。

[参 考 文 献]

- [1] Cortina L M, Swan S, Fitzgerald L F, et al. sexual harassment and assault: Chilling the Climate for Women in Academia.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98, 22(3): 213 - 224.
- [2] 余 峥:《厦大昨晚通报吴春明处理情况,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载《厦门日报》2014年10月15日。
- [3]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02/201410/xxgk_175746.html
- [4]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02/201811/t20181115_354921.html
- [5] 李佳源,方苏宁:《高校性骚扰:特征、现状、成因与应对机制——以女研究生为重点的实证分析》,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
- [6] 王献蜜等:《高校性骚扰发生现状及性别差异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

劳动教育与青年发展

主持人 刘丽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劳动教育既要助力“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要培养学生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意识与能力。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时提出了“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总要求。如何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深入落实这一总要求,成为推进劳动教育必须破解的难题。为此,本刊编发了以下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将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思路:一是从劳动教育直接面向工作世界、劳动世界培养人才的独特价值出发,深度探讨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实践路径;二是从劳动教育渗透德智体美劳的综合育人价值出发,建构以“生活力”培养为主导的劳动教育新体系。期望这种讨论和分析能够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为不断提高青年学生劳动教育的质量带来更多的启示。

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同构共生

■ 刘丽红 曲 霞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政办公室,北京 100048)

【摘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已经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与劳动教育紧密结合、打造创新创业教育升级版,成为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任务。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劳动教育都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问题而进行的理念更新与模式变革,其面向未来工作世界、劳动世界培养人才的共同取向,使二者在结构上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从同构共生的系统思维看,二者在教育目标上的互利性、教育内容上的关联性、方式方法上的共通性和师资队伍上的互借性,为二者的紧密结合、同构共生提供了内在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实践中,可通过“进阶式”教育目标设计、“呼应式”课程体系设置、“贯通性”实践体验训练、“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实现二者紧密结合、双向深化。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刘丽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劳动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曲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劳动教育、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第一批青少年实践与劳动教育课题“在美育教育中打造劳动教育新模式”(序号2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改专项“一流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标准研究”(课题编号:JG18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